



秦嘉鎮

著

文字文化论文选

巴蜀書社
四川出版集團

龚嘉镇文字文化论文选

龚嘉镇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龚嘉镇文字文化论文选/龚嘉镇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8. 8

ISBN 978 - 7 - 80752 - 176 - 1

I . 龚... II . 龚... III . 汉字 - 文字学 - 文集
IV . H1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0867 号

龚嘉镇文字文化论文选

龚嘉镇 著

策划组稿	何 锐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谢春雷
内页题签	程志强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址	www.bsbook.com
发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028)82601551
版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8mm × 146mm
印张	16.5
插页	3
字数	440 千字
书号	ISBN 978 - 7 - 80752 - 176 - 1
定价	4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把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結合起來，把定性分析與計量分析結合起來，把字語研究與文化研究結合起來，以求理論上的深一步認知與實踐中的有效應用。

嘉鎮自動

前　　言

中华文明史上产生了不少非常优秀非常卓越的文化巨人。他们的人格价值与哲学智慧宛若我们头顶的星斗，永远闪烁着照耀后人前行的思想光辉。

在两千六百多年前的春秋前期，华夏大地上出了一位管仲，是他最先向人类发出了“以人为本”的呼唤（《管子·霸言》），那真是先知先觉大智大慧！其后孔、老、墨、孙、韩等百家争鸣，儒家主张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道家崇尚宁静修养自然超逸的人生智慧，立足于“以人为本”基础上的儒道互补，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构架。其中孟夫子的“兼善天下”与“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诸葛亮的“淡泊明志”与“宁静致远”（《诫子书》），在后世产生了尤为深远的人格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历代以学术为志业的学人们，因而由衷地追求为学为人上的自觉自在自足：问学当自强以求是，为人宜自然而归真。

文化的深层内涵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先哲们认识世界的智慧同样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荀子说：“天行有常”（《荀子·天论》），指出客观世界的变化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庄子讲：“道进乎技”（《庄子·养生主》），认为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是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前者说的是认识世界要客观，后者讲的是研究方法要科学。荀子的“天行有常”、庄子的“道进乎技”，再加上韩愈的“业



精于勤”（《进学解》），应该成为我们同学的座右铭。先贤们进而从更高的境界上把为学求真与为人求善联系起来，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一语破的地告诫后人：问学的终极目的在于求德求知以完善人格。对问学对教育如此以人为本的认识，实在是振聋发聩！

唯物论的内核是实事求是，辩证法的实质是新陈代谢，自觉地反省自我是为了宁静地修养自我，科学地认识世界是为了能动地建设世界。今天，中国文明复兴的步伐不断加快，全球文化多元化的趋势日渐发展，在面向世界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时代进程中，在面对利诱求德求知以服务社会的人生历程中，为了不致为物所役而迷失自我，我们应该时常仰望“我们头顶的星斗”。

一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保持完整文化传统的国家，一种民族文化延绵发展五千年，其中自然沉积了顽固的迟滞性，也必定蕴涵着顽强的生命力。“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这也应该是我们认识汉字的基本态度。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连绵使用数千年从未间断从未突变至今仍然生机勃勃的自源文字，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自己的发展历史。汉字脱胎于记事图画的特定背景与汉语语素单音节化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汉字要以单音节语素为单位来据义构形单音成字。中国历史的悠久、地域的辽阔、方言的纷歧，特别是秦汉时期国家的长期统一，要求“书同文”的汉字在记录书面共同语时既要标音更要表义，汉字因此在假借泛滥的状况下通过“以类附声”而走向了形声化。悠久完整的汉语汉文化传统使汉字的体制得以保持并不断完善，不仅据义构形的基本字—字根在甲金篆隶楷中递相对应传承，而且表意的基本手段由单个的取象表意逐步发展成为系统的分部类从。汉字以单音节语素为单位据义构形单音成字并系统保持形义对应，是一

种自源的语素—意音文字。它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受到汉语汉文化的制约和影响，而且是在表意化单音化的基本走向之下以系统的方式进行演变的。毋庸讳言，汉字有着表音功能差、结构笔画繁、字的数量多三大缺点，但是，汉字体系在与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文化认同的互动过程中是始终发挥着积极作用的。几千年来，汉字系统不断地自我完善以能动地适应着汉语汉文化发展的需要，逐步形成了记词方式意音化（字式）、形体结构简明化（字形）、社会用字标准化（字用）的历史演变规律，形成了社会用字相对集中常用字种递相稳定的共时用字规律，形成了基本字符较为集中以文组字合成有理的逻辑构字规律。

现行汉字的应用研究，前沿在中文信息处理，大头在中小学的字词教学，而制约两端使之健康发展的关键是规范化。近半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先后进行了立足点各有侧重的汉字整理规范工作。当前海峡两岸用字处于简繁并存而大同小异的状态，其中的“异”字种字音差别较小而字形差别较大，这些差别随着两岸交流和共识的扩大而呈缩小的趋势。新时期汉字规范应该是顺势而为的科学引导，它必须更多地立足于大众社会中现实的可行，而不可能达到学术研究上理想的最好。因为汉字规范要直接面对诸多不可回避的两难选择：既要顺应汉字系统的简明化规律，又要适应开放交流人机交际的现实需求；既要考虑到内地与港澳台简繁并存的用字现状，更要稳妥地保持内地十三亿人口社会用字的稳定；既是主要针对新时期内地通用层面的用字规范，还要有利于在21世纪实现全球现行通用汉字的“书同文”。21世纪汉字规范化的主要方向当在于：字种上立足现行分级定量，字形上常用趋简系统优化，字音上减少异读辅以拼音，字序上明确规则统一排序，通过协商整合以逐步实现全球现行通用汉字的“书同文”。

作为汉字使用的标准，字表与字符集应该统筹配套，新标准之于旧标准应该继承发展。人用的字表与机用的字符集是可以统一起来也应该互补配套的：字表应是字符集的基础，字符集则是字表的



扩展。社会语文生活发展到一定的时期是需要调整规范的，但新规范应该是在旧规范基础上的完善和发展。国家在1988年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和《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着眼于现行通用而实行分级定量，根据汉字的使用频度与人们的需求层次，将现代汉语通用字递增定量为2500字→3500字→7000字三个级别。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样的认识是客观科学的，这样的规范是积极稳妥的。进一步的工作，一是发展原有规范，把分级定量的字种筛选调整得更为客观以利于应用；二是适应开放交流，为字表中的字种明确对应的字体以利于转换。通过回顾前瞻与权衡比较，我们应该坚持着眼现行通用以实行分级定量，立足通用字种而明确字体对应，把规范的重点放到现代汉语的常用字、通用字、专用字的分级定量上来，放到分级定量范围内的简繁字、正异字、新旧字形的关系对应上来。

二

进入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和平崛起的进程不断加快，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趋势日渐发展，迅速到来的信息时代正在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交际的方式，这样新形势向包括汉语言文字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不断提出新问题，提出新挑战。这既使人困惑更催人奋起，因为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其实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发展机遇。正是这样的挑战，不仅促使如现代汉字学这样的新兴学科应运而生，而且大大推动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发展。方向上，加强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在构建学科理论的同时努力对现实紧迫问题作出回答提供对策；方法上，加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通过综合创新以努力实现研究方法的现代化，这已经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了。

在加快步伐建设现代化和参与全球化的今天，无疑更加需要激浊扬清地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取长补短地吸纳世界优秀文化成

果，在综合创新中努力建设和发展中国新文化。正是处在这样的时代新潮流之中，处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之中，汉字研究出现了三个令人关注的发展势头。

一是综合创新研究方法以致力本体研究。汉字研究曾一度纠缠在外围进行孰优孰劣的无谓争论。走出这个氛围之后，愈来愈多的学者在认真继承朴学传统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和信息技术手段，集中精力从本体上来研究汉字。或从汉字记录汉语的方式上去研究汉字的特色，或从汉字体系的历史发展中去探究汉字的规律，或立足于汉字的规律与现实的国情来研究现行汉字的应用，从而使汉字学领域出现了可喜的新局面。

二是结合汉语联系文化以深入汉字研究。汉字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不仅是记录和承传中华文化的书面载体，是全体中华民族使用的交际工具，而且本身就是中华文化中极富人文性的重要内容，全世界的华人都对汉字有着与生俱来的强烈文化认同。愈来愈多的学者自觉地把汉字研究与汉语研究与中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通过实事求是的深入研究，在汉字学的理论与应用、宏观与基础、断代与谱系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新成果。

三是立足国情面向社会以重视应用研究。在中国文明复兴进程加快与世界文化多元化趋势发展的今天，汉字汉语的研究不仅应与中国文化研究相结合，而且更要为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服务。愈来愈多的学者在构建学科理论时更加注重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汉文字学，在进行应用研究时更加注重把汉字特性与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寻求对策，大家积极参与汉字规范、中文信息处理和汉字教学改革等应用研究，为推动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努力作贡献。

三

认识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认识到汉字研究的发展势头，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把与之相应的新理念自觉地运用



到自己的研究中去，就更需要用心用力了。置身于这样的时代环境，自己在研究的方向和方法上也作了一些探索。反思一下这个认识历程，应该就是敝帚自珍吧。

我研习学问始于“文革”之后，始于教学相长。第一篇文章《大力提高文言文的教学效率》发表在《西南师范学院学报》后，又不断写出了一些讨论古汉语语法的文章。这时我接触到了计量语言学，那种系统计量的归纳方法实在令人耳目一新。1986年我参加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和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联办的古汉语研究班，任课的先生多是各学科在当时就很有影响的著名专家，来自全国各高校的近百名学员则是从年轻的研究生到五十多岁的副教授。大家上午听课，下午去图书馆，晚上整理心得到深夜，那种珍惜机会拼命攻读的情景至今难忘。这次学习使我深受教益，不仅进一步了解了古汉语各学科的发展历史和前沿现状，而且从先生们的讲授中深深地感受到了朴学传统和历史分析的学术魅力。随着知识结构的充实和调整，我的研究逐步转向了训诂和文字。

1990年我申报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行汉字形音关系研究》。为了做好课题，我下功夫研读唯物辩证法、科学哲学、系统论和自组织理论，在关注学科前沿发展动态的同时，努力了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历史和现代趋势，从而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使自己的研究处在开放交流的生态之中。尤其是在认真继承朴学传统的基础上，把系统方法与数学方法结合起来进行计量描写，把自组织理论与历史比较法结合起来进行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立足国情面向社会，把深化认知与有效应用循环起来，努力坚持理论构建也要为现实应用服务的研究方向，是这项课题研究中最大的两条心得。研究事物的历史、现状及其内在规律，是科学的探讨；更上一层楼地去探讨科学的方向与方法，那就是哲学的思考了。一般科学的研究是哲学研究的物质基础，而哲学研究则是一般科学的研究的理性升华。在基本完成这一课题的基础上，自己进行了认真的哲学反思，写出了《现代汉字学研究方法刍议》，对自己的基

本研究思路作出了这样的初步总结：把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结合起来，把定性分析与计量分析结合起来，以力求理论上的深化认知与实践中的有效应用。

作为古汉语教师，我一直爱读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还开过《中国文化概论》和《中国通史》课。在1999年底即世纪之交的那段时间里，我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说“中国”》。原想通过探源析流地讨论“中国”一词的历史引伸过程，来写一篇关于词义扩大的词汇学论文。在搜集消化资料与谋篇立意的过程中，我发现要深说“中国”一词是不能不说中国文化史的。于是就试着把“中国”一词的词义演变，放到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壮阔背景中去讨论；不料如此展开之后，竟然有一种豁然贯通别开生面的感觉。这篇文章的撰写使我领悟到：汉字汉语的深入研究应该与中国文化研究相结合。此后，我又写出了一些文化史论文，在研究汉字的性质规律与新时期的汉字规范时，在应邀为中央电视台撰写汉字文化系列文章时，都较为自觉地从中华文化和汉语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下来分析汉字的特色，从汉字对汉语汉文化的能动适应中来研究汉字的发展，从发掘汉字据义构形中的文化蕴涵来认识我们民族的一些可贵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

正是在这样的不断探索和哲学思考之中，我逐步形成并坚持了自己的基本研究思路：把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结合起来，把定性分析与计量分析结合起来，把字语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以力求理论上的深化认知与实践中的有效应用。

在问学的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了一些先生的宝贵指教。刘又辛、赵振铎、经本植、向光忠、汪耀楠、何必等先生多年来热情地关心着我给我以许多指导，曹先擢、周有光、苏培成等先生多次来函来电话殷切勉励，在拙著出版之际，特向各位先生敬致谢忱。何锐编审的责编工作严谨认真负责，他先后为我精心编辑了两本书，这次又在百忙中为拙著惠赐《后记》予以鞭策，实在令人感激；程志强教授为我书写了扉页后的“自励”，谨并致感谢。



达州市委、市政府和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对我的科研工作给予了热情的关心和支持，谨在此表示感谢。

我在大巴山区从教三十多年，一直走在家乡的山间小路上，做着自己想做也还能做的事。我喜欢“读书·教书·写书”这样的生活方式，看重从思考中得到的那份感悟、充实与承担。自觉地选择方向，自在地把握节奏，不去赶也没有停，只想走得踏实一些。人生是一个“逝者如斯”而需要超越的过程。在商品社会中以为学立身，还是从容一些自主一点，着意守护一份淡静平常的安心。彭耀芬三十年来一直尽心地内助着我，使我在繁忙的教育教学之余得以专心学问；龚伯谦在工作之余，精心为我做了很多校对、编排、制作古文字图片的细致工作。家中亲人尽心尽力的支持帮助，让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本书所选论文是自己在同学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探索，内容大分为文字、文化两部分。文字部分主要是汉字的形音关系、汉字的孳乳类化、汉字的性质规律、新时期的汉字规范四个方向的研究成果，也收入了几篇关于词汇、语法的文章。文化部分主要是历史文化和汉字文化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些论文收入时有的作了一些改动和充实，还有两篇发表时有压缩而这次收入的是全文。

为视野学力所限，书中谬误不少，尚望学界师友惠赐教正。

龚 嘉 镇

2008年3月于四川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内容提要

《关于新时期汉字规范问题的思考》(2005年)

本文是针对《规范汉字表》研制中面临的一些两难问题，就新时期汉字规范的方向、策略与重点发表的意见。汉字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不仅是记录中华文化的书面载体和全体中华民族的交际工具，而且本身就是中华文化中极富人文性的重要内容，全世界的华人都对汉字有着与生俱来的强烈文化认同。新时期的汉字规范，既要适应信息时代的规范化要求，又要顺应汉字系统的简明化规律，加强简明化基础上的规范化，是我们应该继续坚持的方向。新时期的汉字规范，要充分考虑到中国内地与台港澳地区简繁并存的用字现状，既要稳妥地保持内地社会用字的稳定，又要积极适应开放交流人机交际的需求，我们应该采取开明务实的策略，把内地社会用字的通用层面和特用层面区别开来分层规范。新时期的汉字规范，要高度重视汉字的共时用字规律和计算语言学的有关成果，坚持古今分流，立足现实应用，把规范的重点放在现代汉语的常用字、通用字、专用字的分级定量和简繁字、正异字、新旧字形的关系对应上来。鉴于有的大中型字典、大型计算机字库和古籍简体版热衷于扩大类推简化的范围而自主成批造字的现象，强调汉字的类推简化只能是政府行为，类推简化的范围应该限制在专收现代汉语通用字和专用字的《规范汉字表》之内。内地的社会用字必须认真贯彻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内地通用层面上的出版物用字、影视用字、计算机用字和教育用字必须坚持使用规范汉字。

《海峡两岸用字的异同与 21 世纪的“书同文”》（2004 年）

海峡两岸现行用字究竟异同在哪里，差别有多大，分歧是什么，怎样来整合，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本文在已有相关计量成果的基础上，从字种、字音、字形三个方面对海峡两岸现行汉字的异同进行了综合性的计量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两岸分级定量的立足点各有侧重，字表筛选的常用字种近九成相同；两岸常用字读音有九成相同，字音的歧异正在趋于缩小；两岸印刷字形八成相同相近，台湾手写行书有两成简体，其印刷字形之异则在于一简一繁与正体不同。认为海峡两岸的现行汉字目前处于大同小异的状态，其中的“异”字种字音差别较小而字形差别较大，这些差别随着两岸交流和共识的扩大而呈缩小的趋势。在此基础上理性地提出，21 世纪汉字规范的主要方向当在于：字种上立足现行分级定量，字形上常用趋简系统优化，字音上减少异读辅以拼音，字序上明确规则统一排序，通过协商整合以逐步实现全球现行通用汉字的“书同文”。协商整合尚须待时顺势，相关研究则可尽早着手。基于两岸现行汉字大同小异的现实与两岸已有的规范成果，可以先行研制分级定量的两岸现行通用汉字表，明确现行用字范围内简繁字、正异字的对应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摸底分类，逐步协商以整合字形。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整合过程。在 21 世纪实现全球现行通用汉字的“书同文”，是全体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也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历史必然。

《汉字规范与“规范汉字”》（2004 年）

本文是随着《规范汉字表》的研制而撰写的。现行汉字规范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文明复兴的新形势与全球信息时代的新需求，对汉字规范化提出了更高更广更紧

迫的要求，国家新标准《规范汉字表》的研制确是很有必要。文章从汉字表音功能差、结构笔画繁、字的数量多三大缺点入手，抓住利弊同源于据义构形单音成字这个根，历史地讨论了汉字的特色和规律，认为应该把研制现行汉字规范的基点，建立在尊重汉字规律适应时代需求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已有的汉字规范及其正反经验的基础之上。指出“规范汉字”是一个受时代、地域、层面限制的概念，并从内涵与外延的结合上，对《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范围内通用层面上的“规范汉字”作出如下表述：“规范汉字是记录现代汉语所通行使用审定明确而相对稳定的标准汉字，具体指由国家以字表形式正式公布的整理简化了的简化字、正体字与未经整理简化的传承字。”文章历史地反思了五十年来的汉字整理规范工作，理性地前瞻了21世纪全球现行通用汉字的“书同文”，对新时期汉字规范进行了宏观的思考，就字表的基本定位、字量的宏观控制和形音的微观调整等方面的问题，对《规范汉字表》的研制提出了建议。

《论汉字的性质、功能与规律》（2004年）

汉字的性质、功能、规律是汉字学研究中难以回避的基本问题，前贤成果不少但尚需继续深入。汉字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世界上唯一使用数千年从未间断也没突变过至今仍然生机勃勃的自源文字。它脱胎于记事的图画，是在单音词为主的上古时代产生和形成体系的，并在两千二百多年前的秦王朝就初步进行规范实现了全国用字的“书同文”；而悠久完整的汉语汉文化传统，则为汉字体制得以坚持传承和自我完善，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大环境。语素单音节化是汉语区别于印欧语的本质特性，以单音节语素为单位据义构形单音成字是汉字的命脉，表意化单音化是汉字记词方式的基本历史走向。本文把汉字的产生与发展放在汉语汉文化的历史大背景中去考察，始终抓住汉字以单音节语素为单位据义构形单音成字而系统保持形义对应这一特色来展开研究。首先，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汉字与汉语汉文化的历史关系上多角度地讨论了汉字的性质，认



为汉字在据词造字的方式上是据义构形形兼音义的意音文字，在文以记言的层级上是方块形的单音节语素文字，在文字与文化的关系上是蕴蓄着深厚华夏文化内涵的自源文字，要言之，汉字是自源的语素—意音文字。继而，从汉字系统的自组织能力上多方面地讨论了汉字的功能，认为汉字因据义构形而形具表意性，因单音成字而音具兼容性，因形义对应而字具有理性。最后，从汉字的演变趋势和内在联系上多方位地讨论了汉字的规律，认为汉字具有记词方式意音化（字式）、形体结构简明化（字形）、社会用字标准化（字用）的历史演变规律，具有社会用字集中常用字种较少的共时用字规律，具有基本字符集中以文组字有理的逻辑构字规律。

《部首“乡”的类意义》（1992年）

本文从汉字孳乳分化的角度探讨了部首“乡”的类意义和从“乡”字的类联系。文字据形标音的本质与汉字以形示义特色的结合，使据义构形形兼音义成为汉字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核心字根的基础上和以文组字的造字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部首，表示的是一种类意义，其形义对应的类联系是汉字表意的基本手段。部首的形成为“以类附声”生成形声字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而形声字的大批涌现又加快了部首的完善和汉字系统类化的过程，从而有力地加强了汉字以形示义的表意性和形义对应的系统性。由《说文解字》的“凡某之属皆从某”到《类篇》的“凡某之类皆从某”，就反映了古代学者对这一规律的深刻认识。

《古今字说》（2000年）

“古今字”原本是因“古今人用字不同”而“以今字释古字”的一个训诂条例。清代的王筠、徐灏等人则从汉字体系历史发展的角度立说，把相承孳乳的分化字称为古今字；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把这种文字学上的古今字最先纳入高校教材。正如徐灏所说“凡古今字有二例”：一着眼于古今的“用字不同”，意在以今字

训释古字；一着眼于古今的“造字相承”，旨在探求汉字的孳乳分化。本文从汉字发展孳乳的角度深入讨论了文字学中的古今字问题。首先把作为训诂条例的“古今字”这一概念严格排除，在此基础上从兼职分化的必然、相承而生的方式、古今字间的联系、孳乳分化的途径等方面，探讨了古今字的历史作用、本质特征和孳乳规律。古今字是在单音词大量增加而同音字过多兼职的大背景下分化产生的，根词的系列裂变总是要求新字要能反映新词衍生的系统性，而假借泛滥和字形演变则促使汉字体系重建形义联系以强化汉字的表意性。为音同而益类，因义别则加旁，正是在词汇系统与汉字体系的协同作用下，一对对的古今字相承而生，其“以类附声”分化出来的今字就是最早的形声字。古今字的产生，就古字而言是兼职的分化，就今字而论是字族的类化，古今字就是具有孳乳关系的分化字。时有先后，字有承袭（形、音、义），职有分工则是古今字的本质特征。最后以此为据圈定界域进行辨析：认为古今字与异体字的区别，在于是职有分工的孳乳还是音义相同的变易；古今字与通假字的区别，在于是历时的相承造字还是共时的同音混用。强调从古今字入手，是形音义三结合成体系地研究汉字演变源流的重要途径。

《汉字形音关系概说》（1994年）

本文是作者申报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现行汉字形音关系研究》一书的基本结论部分。课题以《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的7000通用字为材料，首先编制了《现行同音字汇编》、《现行多音字汇编》、《现行形声字汇编》，然后从现状的计量描写、历史的性质探析和具体的现实应用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从整体上动态上系统地考察了现行汉字的形音关系，从文以记言的角度深刻揭示了汉字形音关系的逻辑联系网络、历史演变进程及其现实有效应用，指出汉字的形音关系是因形音结合的脆弱性与形音联系的多重性而形成的一种多层次的综合结构关系。汉字的形音关系具有拼音文字所没有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在于形音结合上与生俱来的脆弱性，